



中共党史

口述

实录

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
四
卷



人民公社化琐忆

逢先知^①

回忆田家英和我在富阳的一次调查

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说:“你这次没有参加会议,我怎么不知道?”随后让会议组的同志给田家英送去一套会议文件。

1月20日,田家英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志,与我汇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1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中央档案馆同那里的同志一起编辑毛泽东著作全目,突然接到田家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回中南海。我急急忙忙赶回来,读了毛泽东的信,即作出发的准备。

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离开北京,22日到达杭州。

这次调查,是在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的地步,是在毛泽东面临严重经济困

^① 逢先知:党的理论工作者。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历史口述实录

一四五

难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也是在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心扭转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贯热心作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的田家英,此时此刻被委以重任,能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点力量,自然感到高兴。

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后同嘉兴合并)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我被指派到那个差的生产队,叫和合生产队,是田家英重点抓的点。当时所说的生产队,就是后来的生产大队,略于现在的大自然村。调查组有省里的同志参加。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长的薛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调查。毛泽东住在杭州,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

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既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问题,又在当地干部中起了表率作用。

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两句话:“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幅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叫做“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反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组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准搞特殊。有一个调查小组,一到公社,公社干部送来一大碗猪肉,调查组的同志吃了。田得知此事,赶到那里,狠狠批评了一顿,生气地说: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你们还吃肉!让他们都作了检讨。后来,在富阳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就此事向当地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调查组有缺点,开始公社给肉吃,没有断然拒绝,是我们的缺点。”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划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田家英在调查中,十分注意搞好同当地干部的关系,很尊重他们,又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原则引导和教育他们。在一次有县、社干部和调查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田家英说:“调查组的同志,不能骄傲,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从上面来的调查组总是给老百姓做好事,而不是要东西(公粮),所以往往给人家好的印象。公社干部的日子比我们不好过。挨骂的是你们,好话都是我们说。”这一番话,既教育了调查组的同志,又深切地体谅当地干部的难处,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对不对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就拿食堂问题来说,



调查组的两个点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点上的调查,由于没有深入下去,仍然受旧框框的束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上的调查,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当解散。田家英参加了那后一个点的调查,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是,善于不善于发现问题是一回事,敢于不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像食堂这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又是一回事。当时,主张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包括其他一些调查组,还大有人在;过去有些人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记忆犹新;中央刚刚发出的“十二条”指示明文规定,必须“坚持食堂”,等等。所有这些,田家英不是没有考虑,但最后还是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田家英敢于直言的精神,在重要关节上又一次显示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田也向毛陈述了这个意见。我参加调查的那个部位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这个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找来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深谈了一次,并批评了他。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直接指导我的调查工作,让我和省里的一位同志对和合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从土改后到公社化的全般历史,作了详细调查。参加的人不多,请来一位老贫农、一位老雇农、一位老中农和生产队队长,共四人。我们促膝交谈,有问有答,既是调查会,又是讨论会,连续谈了五、六天。这样,对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及现状了解得比较透彻,这对于了解土改后中国农村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大有益处。有了历史的比较,哪些东西是好的应当恢复,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应当抛弃,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田家英把这个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就在这次汇报中,田家英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采纳了。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这个工作条例的由来时,是这样说的:“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2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提出一些重要意见。现根据我当时听传达的记录,将要点记载于下:

一、怎样克服“五风”改变面貌问题。问题主要是“五风”,瞎指挥。除自留地、蔬菜地以外,再留百分之三的土地归小队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

二、退赔问题。要决心赔,破产赔。谁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 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
历史口述实录

一四五六

三、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四、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调查时,看看坏的,也看看好的,不然就要钻牛角尖。(田家英着重汇报的是和合生产队的情况,这是一个工作差的队,毛泽东是针对这一点讲的。)

五、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者把小队当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变大队,明升暗降。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几个小队悬殊大,拉平分配,破坏积极性。基本原则是增产。

六、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三十户中有五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七、干部手脚不干净的问题。百分之三四十的贪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脚不干净。统统撤掉不行。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

以上这些,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人民公社以及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是已经明确了,有些是正在酝酿之中。后来他又听了湖南、广东等调查组的汇报。这就为广州会议的召开和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作了准备。

2月21日,田家英和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离开杭州去广州。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准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2月26日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主要是确定条例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我也参加了会议。从27日起,进入具体起草阶段,主要由廖鲁言、田家英、王鲁、赵紫阳分别起草。

3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参加会议的是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区委书记,主要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的“三北”(指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主题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他根据三个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对待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这个问题,浙江调查组没有提出来,湖南调查组



没有提出来,广东调查组没有提出来,其他众多的调查组都没有提出来,尽管各个调查组都各自提出了一些好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而这个思想是由毛泽东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概括出来的。它使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不能不对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表示钦佩。当然,他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既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受他自己主观认识的限制,所以还是不彻底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是党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农村问题的指导思想。

3月14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

3月15日,工作条例经过修改,写出第二稿,第二天,送给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印发会议讨论。会议共讨论了两天,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没有作出结论。

3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有一段插话。他说:(一)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济工作越作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二)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刘少奇这段话很重要,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表明当时刘少奇已经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持否定态度。

3月19日,开始修改工作条例第二稿,吸收每一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自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赵紫阳,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胡乔木向起草组传达了毛泽东当天中午的谈话。根据我当时的记录引证如下: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历史口述实录

一四五八

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胡乔木代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很长,别的内容人们大概都忘了,但有一句话比较不容易忘记:“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当天晚上,毛找田谈话,指示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再到江苏去调查二十几天,搞三个点。后来,我们没有去江苏,而是继续在浙江调查。

广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这就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是毛泽东提议创办,并在他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10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分别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乡)和修武县(一县一社的典型)做调查。时间是10月28日到11月4日。当时,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问题不少,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普遍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的一席话中得到一个启发。那位书记同志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末,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县吗?田家英听了觉得有理,非常重视这个意见。

我们还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



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做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当时,我们这些参观者尽管对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干劲不能不表示赞叹!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大量资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季节。我们亲眼看到,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无劳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过去快30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应持否定态度,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是值得称道的。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这一方面也应当看到。

11月5日晚,毛泽东南下郑州,路经新乡,田家英、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修武县委书记的意见。次日,田、吴离新乡去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根据田、吴的调查和其他人的反映,在会议上强调要使农民休息好,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在讲公社所有制时,他引用了修武县委书记那段话,用以说服一些认为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人们,表扬了这位书记,说他是很有头脑的。

在田家英、吴冷西奉命调查修武县、七里营之前,毛泽东先派陈伯达、张春桥赴河南遂平县调查,他们搞了一个鼓吹“共产风”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田、吴调查给了毛泽东以实际的帮助,对纠正错误起了作用。而陈伯达等人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1958年11月到12月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从原则上解决了公社化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实际上,问题和困难却暴露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心里觉得最不踏实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武昌会议确定下来并且已经公布的1959年生产的四大指标(指粮、棉、钢、煤的指标),这四大指标在武昌会议上是一致通过的,已经算是“留有余地”。会后陈云向胡乔木提议不要公布,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还是在公报内公布了。这事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另一个是农业问题。为了了解农村整社情况,1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赴四川调查。

从四川调查到庐山会议

1959年初春,调查组来到四川,调查地点是新繁县(1965年并入新都县,在成都北)崇义桥大队。当时,新繁县原是一个公社,崇义桥乡是下属的一个大队,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分别改为县和公社。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外祖家,当时还有他的一个舅母健在。因为有这么层关系,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就选中了这个地方。田家英觉得,“崇义桥”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历史口述实录

一四六〇

这个名有点儿封建味道，便提议改名“大丰公社”。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田家英，把“大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县是成都平原最富饶的县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观高潮”那次，也曾来到成都附近。但这一次所看到的景象大不如前了，多少给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觉。1956年时那茂密的林盘（在每一家房屋周围长着的竹林），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孤竹，而社员还在根据上级指示继续刨竹根开地种粮；过去象锦绣一样美丽的田园有点荒芜的样子；昔日热闹的集市不见了，偶尔遇上一次赶场，上市的农产品也寥寥无几；社员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里，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吃饭的时候，排着长队，一家一户地到食堂领饭。晚间，偶尔可以看到少数社员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说明那几户社员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点吃的，填补一下肚子。大多数社员则没有粮食在家做饭吃。这些都是我们目睹的实际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听说新繁县是亩产千斤县，大丰公社也是亩产800斤。既然是丰产高产，为什么社员又这么缺粮呢？成了一个谜，是一个不管怎么算帐也算不清楚的问题。然而谜底，被善于做调查的田家英很快揭开了，这就是虚报产量。虚报产量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不单是新繁、崇义桥一县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很可能这是最早揭破这个问题的一个点。

这时，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继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继续泛滥。继武昌会议之后，他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田家英没有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但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十分赞成的，特别称道毛泽东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田家英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主席高明，我们在下面调查，搞了老半天，怎么也提不出这样大的问题。”毛泽东概括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也不可能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刹“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象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



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气,博得人们的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绝非那种畏首畏尾,缺乏胆识,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倒有点像毛泽东的脾气。

后来,当调查组离别大丰公社的时候,8月6日那天,我们特地拜访了老县委书记,一方面是告辞,一方面想听听县里对调查组有什么意见。那位老书记,年过50,是南下干部,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乡下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对“大跃进”那一套,包括虚报产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那一天,他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这也表示他对田家英和调查组的信任。

他说:“你们这样做得对(指反对浮夸,反对过度密植等)。你们如果也象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给中央讲,国家就危险。你们如果是地方干部,照那样做就要挨批判。你们刚来的时候,那些做法,我想是不是右一些。但后来想了想,你们的地位不同,是从中央来的,对你们来说,这不是缺点而是做得对的。除此以外,对你们再提不出什么缺点。你们是按主席的指示做的,做得对。但崇义桥乡的干部就不行了,他们上有省委、地委、县委。你们是坚持原则的。”

“你们那里的群众干劲大,就是因为密植是自愿的。我们这里不大自愿。如果县委书记象你们那样,能不能脱手?那样做,就要犯错误。搞密了,就是水稻一风吹倒,减了产,也不犯错误。搞稀了,谷子打得多还好,减了产,就受不了。老实说,你们那样做,我是同意的。栽秧子的时候,一天几次电话,催着我们抓紧密植。”

以上是从我的笔记本抄来的。当时老书记再三叮嘱我们,这些话只是内部对我们说的,不能向外面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30年后的今天,公开出来,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无益处。

1959年6月下旬,田家英离开四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我把他从成都送到重庆,独自一人回到新繁。不知怎的,一种惜别和孤独的感觉笼罩了我的感情,过了几天才逐渐消失。

田家英在大丰公社近4个月的调查中,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是那样地平易近人,那样深切地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那样地爱护和帮助当地干部。到了插秧季节,肥料不足,他带头同干部群众一起到成都拉粪水,一个来回30里地,有一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 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
历史口述实录

个晚上拉了两趟。人们最爱听田家英讲话,不仅因为他口才好,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家乡口音,更重要的是有内容,有道理,能打动人心。他善于把深刻的道理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最容易理解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发扬革命传统精神时,讲到毛主席为了革命,全家牺牲了六口人,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有的人哭了。田家英给大丰乡的老百姓和干部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直到1983年我重访这里时,当年的干部一提起田家英,有的人还流泪不止,为他的含冤早逝而惋惜,深深地想念他。记得那天,我一到大丰公社,镇子上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说:“田主任回来了!”有人就纳闷儿:“田主任不是死了吗?”一位妇女对我说:“田主任真是好人啊!”我这次来到大丰,看到的又是一番景象。亩产已过千斤,把1958年的浮夸产量数字都远远抛到后面去了。1958年人们想象中的高产,在20年后变成了现实。集市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量农产品上市,杂以服装日用品等,应有尽有,繁荣空前。这不由地使你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田家英在近4个月的四川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第二手材料。调查期间,我们还经常谈论全国形势,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个认识和一批材料上庐山的。调查组继续留在四川,随时向他提供调查材料。

田家英上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发生争吵。后来毛泽东说了公道话,大意是:不要怕别人告状嘛,没有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说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没有,它就没有。

田家英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在会议前期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中,他把自己对形势特别是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看法对别人说了,这些话很快在少数人中传开了。当整个会议转入反“右倾”,他就被人揭发,成了批评对象。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没有被划到“军事俱乐部”里面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田家英为了保护一起谈过话的胡乔木,冒着危险,去向李锐打招呼,叫他不要说出胡乔木谈论过的一些话。在当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情况下,田家英这样做是对的。这同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中,对别人的错误不揭发,不批评,反而进行包庇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两码事。这是应当说明的。田家英后来对我说,他当时考虑的是:胡乔木对党的贡献和作用比他大,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保护下来。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田家英为党的利益作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

田家英在庐山的处境同我们在下面的命运休戚相关。8月6日,我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田家英有要紧工作,要我们立即返京。8月9日我们赶回北京。不知出了什



么事,放心不下,给田家英通了电话。田家英说,他同四川主要负责人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高度密植和产量浮夸问题,不过多数人都同情他。要我们回来,主要是怕我们处境困难。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是田家英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风浪。在这次错误进行的党内斗争中,他没有“揭发”别人,而且还保护了同志。他对一些善于窥测政治气候,寻机显示自己很“革命”,或者在“大跃进”中一贯表现极左,而对别人乱批乱揭的人,是很厌恶的。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那一边倒的政治大潮中,田家英对庐山会议的是非不可能象后来认识得那样清楚,对三面红旗也不可能否定,他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毛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是在极左思潮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事后他向人表示,他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时的检讨是言不由衷的。那时,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已离开了他曾经全力提倡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头脑已经不那么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田家英还多次向我流露他在会议后期的心情,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

显然,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期间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在庐山会议前期,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到了后期,他们也都不得不进行这样那样的检讨,但是形式上已很不一样。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了。会议之后,毛特地让田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历时两个月。这表明,毛泽东对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无庸讳言,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摘自《新华文摘》

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刘 炼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1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



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1.5倍。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目前农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个重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粱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在这年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星”的计划改为放小麦“卫星”。当晚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各乡纷纷宣誓,保证小麦亩产超过两千斤,并要使各条战线放出的“卫星”,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



大会”上,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

于是,在这年6—7月间刚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成的100多个大合作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2000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消息,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机会难遇。可是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高的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蔑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规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第四部

从凯歌行进到曲折探索

中共「八大」到文革前夕历史口述实录

一四六六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可是学生们挖完了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成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们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什么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原来所谓的“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里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这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便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的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是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相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份毛主席到这里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从生老病死到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来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



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在这年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二十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